

法輪大法好



年画《丰》 李子敬作 (选自正见网)

福临门

新年伊始天地春，万象更新正乾坤。
 梅开五度升瑞气，真相到家福临门。
 法輪大法真善忍，敬念户户绕祥云。
 幸福光景长住存，佛恩荫荫代代人。

破网软件下载地址

自由门专业版: <https://j.mp/fgp88>

自由门安卓版: <https://j.mp/fgv88>

亦可经由右边两个二维码下载

建议使用 IE、Edge、Chrome、Safari、火狐等浏览器



自由门电脑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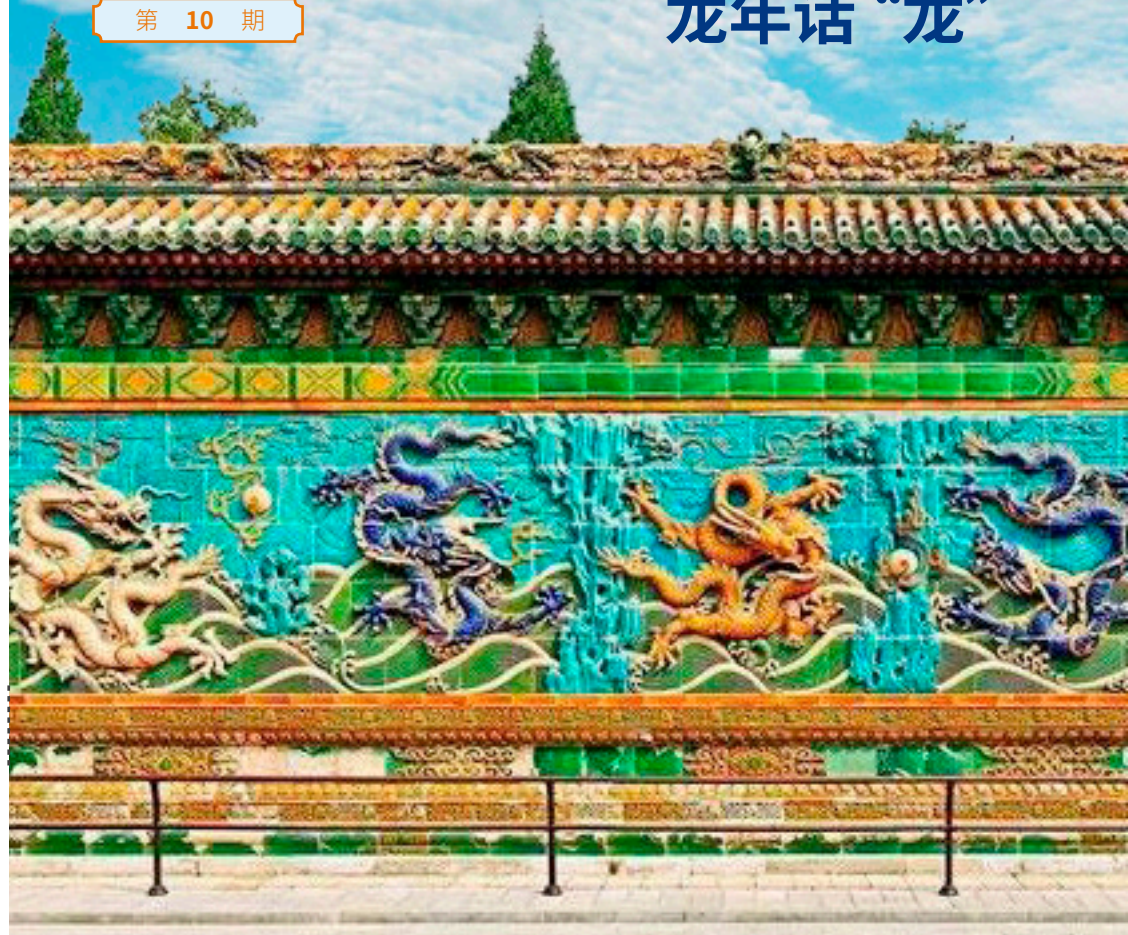
自由门安卓版

还原

第 10 期

- 这两位民国大师是如何看透毛和中共的?
- 患者贴心的眼科医师

龙年话“龙”



目录

| 卷首一文 |

- 龙年话“龙” 1

| 百年真相 |

- 这两位民国大师是如何看透毛和中共的? 4
- 民国时期为何出大师? 15

| 人物春秋 |

- 患者贴心的眼科医师 20

| 揭穿谎言 |

- 23年前大年除夕的那场“伪火” 28

| 传统文化 |

- 裴度还玉带改命 30

| 世道沧桑 |

- 民众心声：共产党已经烂到根儿了！ 32

龙年话「龙」



大哥答：你是说为共产党的政权而战吧？这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？

记者问：那你会让你的子女参战吗？

大哥答：你怎么能带头违反共产党的法律呢？我被共产党判过刑，进过监狱，共产党讲株连，我们祖孙三代不能参军，不能考公务员、事业编，现在打仗想起我们来了？不光我不会参战，我的子女也不会参战，我的孙子孙女都不会参战！

大哥又说：共产党还搞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我告诉你，在每个词前面加个“不”字，就是现今社会的真实写照。（附：中共标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：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；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；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）

我问大哥：你这样说完记者说什么？他说：记者啥也没说，到地方就默默地下车了。

从老百姓日常的对话中，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共的失望，厌恶情绪可见一斑。

有的说：“共产党已经烂到根儿了！”

有的说：“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。”

这些都是民众觉醒后的心声。70多年来，中共一贯以欺压、迫害百姓为己任。如今百姓觉醒，中共还拿什么续命？

法轮功是修炼，对政权毫无兴趣，面对中共长达24年的迫害，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是以善的方式，讲清真相反迫害，告诉民众中共是邪灵，退出它的党团组织、抹去曾经对它发的毒誓和兽印，才能远离险恶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（资料来源：明慧网）◎

民众心声： 共产党已经烂到根儿了！

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天，我打车时遇到一位司机大哥，他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。

大哥说，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记者坐车采访他，大哥本来不想回答，因为他觉得他一说就忍不住说实话，而这些实话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言论。但是，这个记者问的问题，太让人生气了，他实在没忍住就回答了，内容如下：

记者问：如果打仗了，你会为国而战吗？



2024年农历大年到了，今年是龙年，首先祝读者朋友们龙年好运，安康吉祥。

在中国，“龙”文化源远流长，“龙”无所不在。地域山川的名字、古代的艺术绘画和雕塑、成语故事、传统节日等，都有龙的踪迹。中国人结婚时要祝福“龙凤吉祥”；对孩子则是“望子成龙”。

在中华文化中，有关龙的成语就达二百多个。如“虎踞龙盘”“龙腾虎跃”“画龙点睛”等等。

相传，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张僧繇的画家，画技非常出色。有一天，他在一个寺院的墙上画了四条龙，这四条龙画得威风凛凛，活灵活现，就像真的一样，只是都没画上眼睛。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不给龙画上眼睛呢？”张僧繇说：“画上眼睛，龙就飞走了。”人们不相信，偏要让他画上。

张僧繇没有办法，只好用毛笔在龙头上点上了眼睛。谁知，刚点完两条龙的眼睛，天上就电闪雷鸣，刮起了大风，下起了大雨。轰隆一声，墙壁被震破了，两条龙腾空而起，飞到天上去了。而墙上就只剩下没点眼睛的两条龙了。

这是“画龙点睛”的传说，“画龙点睛”比喻加上最关键的一笔。

还有一则“鲤鱼跃龙门”的传说：

相传古时，大海里有一座门，叫龙门。这个龙门很大，大到看不到全貌。有一天，许多鲤鱼游到了龙门下被挡住了，鲤鱼们想跳过龙门游到其它地方去。经过无数次跳跃，一条鲤鱼终于跳过了龙门，但这条鲤鱼却瞬间变成一条大龙，长着四条腿，浑身长满鳞片，头上有角；既能上天，也能入海，还能呼风唤雨。

中国人后来引用了这则神话传说，把考生“金榜题名”与“鲤鱼跃龙门”相媲美。

东汉学者王符认为，龙具有兔眼、鹿角、牛嘴、驼头、蜃腹、虎掌、鹰爪、鱼鳞、蛇身，九种动物合而为一的形象。

那么，古代的人是如何知道龙的长相呢？据说，古代有些画家和匠人都是有特异功能的，他们能看到龙的长相，就用绘画、雕刻的方式把龙的形象流传了下来。

就拿十二生肖来说吧，龙排在第五，和其它活生生的动物并列，那么就足以证明，龙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，只是龙是神兽，它在另外空间，不容易在我们这边显现，所以不容易看到它。

中国古人以龙为尊，帝王自称“真龙天子”，戴龙冠、



匆赶来一个女人，原来此人叫韩琼英，她的父亲韩太守因为得罪了国舅而被捕入狱。韩琼英与母亲辛苦筹资，得到了这条玉带，以便营救父亲。可是，玉带却不慎遗失了。母女二人走投无路，父亲也救不成了。

裴度听完事情经过后，确认韩琼英是失主，就把玉带还给了她们。一条玉带，救了三条人命。

此后术士再见裴度，称他面相大有改变，宜考取功名，后来果然应验。

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裴度进士及第，在朝中做官一直做到宰相，最高官至中书令（正二品），封晋国公，成为中晚唐时期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重臣。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在朝中做官。

据说，“裴度还玉带”的故事，还画在颐和园长廊的壁画中。

俗话说：好人有好报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由更高级的生命在掌管，我们今世的表现也决定着未来的命运。做一个符合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好人，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。（选自正见网）◎

裴度还玉带改命

现在这个社会，很多人从早到晚梦想着能够发财。如果通过正当的辛苦劳动付出，那么倒也无可厚非。只是有些人坑蒙拐骗、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，这就很危险。古人道德高尚，见财而不忘义，流传下来许多名人轶事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“裴度还玉带”的故事。

裴度（765年—839年），字中立，中晚唐河东闻喜县人。

少年时，裴度是个穷书生，父母双亡，家境十分贫寒。因衣食不济，



而寄居在香山寺中。一位术士说他面相不佳，以后可能要饿死。

有一天，他在香山寺的香案上捡到一条玉带。这条玉带金丝走线，镶着宝石，估计价值1000两银子。如果裴度贪心的话，就把玉带拿走了，但他想到，丢玉带的人肯定会非常着急，于是他站在那里等失主回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急匆

穿龙袍，坐龙椅；古人遇干旱，要向龙王祈祷降雨；在四大名著《西游记》中有四海龙王；中国民间有赛龙舟、舞龙表演等等。

当然，传说中的“龙”也有好坏之分，如祸害人的龙叫恶龙，民间有“周处除恶蛟”的故事。

历史典籍中，龙的传说比比皆是。如《史记》中记载，中华民族的祖先——黄帝得道时，有龙垂下龙须迎黄帝升天。黄帝骑上龙背，而群臣无法跟随，只能抱着拉断的龙须哭泣。

中国历代也有人曾经亲眼目睹龙的事件。如《晋书》记载，东晋永和元年（公元345年）四月，有黑白两条龙出现在龙山。燕王亲率朝臣在距离龙二百余步的地方观看。

近代也有类似事件。1934年夏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了“坠龙事件”。当时的《盛京时报》报导了此事。

中国人祖先认为，龙是吉祥神兽之一，是掌管人间天气的神灵。“敬天敬神”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，也是中国传统新年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过大年时，人们要祭拜祖先，同时向上天祈祷，保证自己要做好人，从而希望能得到上天的佑护。◎



◀ 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栏目视频截图。



中共为了达到人们仇视法轮功的目的，顾不上应该满足的基本常识：摄影者的便利性、灭火器的来源、烧不破的塑料瓶、违背医学常识的疗效。

“国际教育发展组织”于该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，就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，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“国家恐怖主义”行为，指控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是对法轮功的构陷，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。声明中说：从录像分析表明，整个事件是“政府一手导演的”。在场的中共代表面对确凿证据，没有辩词。◎



▲ 傅斯年



▲ 钱穆

这两位民国大师是如何看透毛和中共的？

在民国知识分子中，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，一位是傅斯年，一位是钱穆。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、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、奇才和大师级人物，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。此外，他富有激情、刚烈、嫉恶如仇的性格，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，人送“傅大炮”的称号。后者钱穆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，与陈寅恪、吕思勉、陈垣并称“现代四大历史学家”。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，传播中华文化。

23年前 大年除夕的 那场“伪火”

23年前的除夕，2001年1月23日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人“自焚”事件，中共媒体第一时间报导，称“自焚”是法轮功学员所为。央视还将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的伪造影片在全国连续播放，震惊了中国，也震惊了世界。

在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中，原本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人变得疑惑了；原本支持家人修炼的亲属突然反对了。人们忘记了自己曾经因为听信宣传而憎恨过地主、资本家、走资派、反革命分子和“天安门暴徒”。

然而，如果把23年前的央视版“天安门自焚事件”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，便会暴露出很多破绽，说明这场“自焚”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与骗局。

1
《焦点访谈》的录像显示，刘春玲没被火烧死，却被军警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。

2
天安门巡逻的警察，几分钟内就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，“应付”“自焚”事件。

3
在“自焚”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，气管被切开后4天就能接受采访，还能唱歌。

4
“王进东”衣服已被烧焦，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，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；警察一手拎着灭火毯，在他身后悠闲地摇晃，等他喊完口号才盖在他头上，没有灭火的急迫。

有意思的是，傅斯年、钱穆都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著名文人。1949年8月，毛在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一文中称他们是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”的“其中的极少数人”。

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？那是因为与诸多上当受骗留在大陆、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分子不同，傅斯年、钱穆不仅学问做得好，而且颇具慧眼。虽然他们理念不同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，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，选择了离开大陆，得以善终。

黄河流域第一才子——傅斯年

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，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，并曾出任宰辅，家门显赫。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，熟读儒学经典，号称“黄河流域第一才子”。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，学习国学，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。

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，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、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，学习实验心理学、生理学、数学、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、勃朗克的量子论等，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了兴趣。

1926年冬回国后，傅斯年

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和历史系、中文系主任，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并自任所长。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，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，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。

亲历中共广州暴动

到广州不久，傅斯年就亲眼目睹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“广州暴动”。

那场暴动有多可怕？国军抗日名将张发奎，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，3天之内，共产党到处残酷烧杀，烧毁的街道估计30多



▲ 1927年广州暴动后的城市。

条，房屋万余栋，杀死无辜民众1万5千多人，伤者就更难以计数了。整个广州陷于恐怖之中。

张发奎说，“我亲眼看到遍地死尸。”尤其是在天字码头地区，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，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，“我们收埋了两千多

具尸体，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”。

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曾披露，在暴动前，广州共产党就拟好了捕杀名单，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，傅斯年也在名单上。还好有人通风报信，傅斯年逃到朋友家中，躲过一劫。

广州暴动，其实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，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，不过血腥程度已经震惊傅斯年了。

1932年6月，他发表《中国现在要有政府》一文，其中谈到，共产党“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，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，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，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”。

傅斯年仔细研究过中共的理论，看过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等共产主义书籍。上世纪30年代，学过心理学的他总结出，中共的所谓“阶级斗争”，实际上是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：

一、中国人恨西方人；二、穷人恨富人；三、寻常人恨地位



我看病人非常担心他的眼睛，就开导他说：“现在设备好、技术好，像你这样的病人，治疗效果好的不少。你千万别这么紧张，精神紧张，血糖、血压都不稳。”住院期间，在我的关心下，他的心情好多了，他很感激我。

手术前，他和他妻子给我送红包，我拒绝不要。他们很惊讶，说：“哪有不收红包的啊?!”是啊，像我这种水平的医生，手术台数这么多，一年下来，光红包就至少能收入50万元。

我告诉他们：“我是炼法轮功的。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我从

来不要红包。”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我及我家人的受益情况。他说：“没听到你讲之前，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。主任，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，看到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，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。”

我给他做了手术。术后，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，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。

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。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，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！（选自明慧网）◎

的情况，验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如果第二天做这个手术，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，那就没有视力了。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，还有 0.3 的视力。

给他手术的第二天查房时，他的家属得知我就是手术医生，郑重地给我鞠了个躬。

出院时，这位家属找到我说：“主任，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相信我，来到我这里，是我们的缘分。我就应该尽心尽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，我跟你说话，感觉全身都在震动，汗毛往起竖，你说话有能量。”随

后，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。他明白了真相后，高兴地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他连连说：“法轮功好，你说的话我信，法轮功真了不起！”

拒绝“红包”

几年前，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糖尿病，视网膜病变很重。看了几家医院，都说病情重，手术效果不好。经他当地医院主任的介绍，他来找我，我热情地接待了他。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牵拉、脱离范围很大，病情严重。

超过自己的人；四、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；五、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，无名者恨知名者；六、农村人恨城市人；七、子女恨父母；八、年青人恨长辈。

傅斯年认为，中共的“阶级斗争”就是把人的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了。回看历史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的中国人，对此应该有切肤之痛。

延安之行 认清毛与中共

抗战后期，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，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。此时，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（多为有名气的知识分子）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，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。

1945 年 6 月 2 日，黄炎培、



▲ 1945 年 7 月 1 日延安机场合影。自右至左依次为毛泽东、黄炎培、褚辅成、章伯钧、冷遹、傅斯年、左舜生、朱德、周恩来、王若飞。

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 7 人，联合致电毛泽东，提出访问延安。两个星期后，毛才复电表示欢迎；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。

1945 年 7 月 1 日，傅斯年与黄炎培、章伯钧等一行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。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，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，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。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、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，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。

7 月 5 日，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。与黄炎培称“延安之行如坐春风”不同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。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，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，也就是反自由、反民主的作风。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，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，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，都看得非常熟，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，加以利用。因此傅斯年认

为毛不过是“宋江一流”。

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：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，看到密密层层、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，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：“堂哉皇哉！”毛有点察觉，但并没有回应。

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，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。他说，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，最无耻的是黄炎培，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，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。因此，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。

对苏联中共无好感

事实上，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。

他宣称：“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，所以反共反苏。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，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，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，则自身先站不住，反共之结果，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。”



的医生也不责备，从不回当地医院闹事。

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：“有事就找她，她为咱们着想，还为患者着想。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。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。”

3 年前的一天，我正在做手术，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，说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，在他们医院治疗了 3 天，效果不好，请我帮忙处理，我答应了。

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 7 点了，给病人办理了住院。我当天手术多，从早上 8 点半开始做手术，一直做到晚上 11 点半。我的手术结束后，我检查了那位

眼内炎的病人，我认为感染很重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的助手说：“老师，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。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，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，都是第二天再做。”

我知道，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身心不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，我哪会有体力再继续做下一台手术？我怎么能做到为了患者而不顾自己身体的巨大透支呢？师父要求我们修到先他后我、无私无我的境界。

半夜 12 点多，我又上了手术台，给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。手术中，我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

把手术做好。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一定要为患者负责，一定要把手术做好。如果我没有信心，那我就不能做这个手术，我不能把患者当成“小白鼠”。

信心十足的我上了手术台。我心里平静，精力集中。每一步骤我都做到位。不求快，只求稳，我顺利地完成了手术。术后第二天，病人视力 0.8，病人非常满意。

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：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，手里要不瞎一百个眼睛，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体手术的医生。可是，我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 3 年间，我的手术没有一

例是失败的。这不就是奇迹吗？

我在日常工作中，一直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。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我的身心素质，也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所以，我才取得了高超的手术技巧。

为别人着想

有时，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我，我都尽心尽力帮忙。遇到病情急的，我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，急诊做手术。由于我这样做，来的患者治疗效果又都好，他们对下级医院



▲ 台湾大学的“傅园”，傅斯年先生陵寝。

在其眼中，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，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，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，社会秩序就将大乱，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，文化变成沙漠……

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，十分不安。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：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，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，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，绝对不会当共产党！

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，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，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。1950 年 12 月，因突发脑溢血，傅斯年去世。

在其追悼会上，蒋介石亲临致祭，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，致祭者共计 5,000 多人，而挽联、祭文、唁函唁电、纪念文章亦相当多。为了纪念傅斯年，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，人称“傅园”。

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——钱穆

祖籍江苏的钱穆，7岁入私塾读书，10岁进入新式小学，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，在这里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中学停办，钱穆遂在家自学，后到一小学任教。据余英时《一生为故国招魂——敬悼钱宾四师》讲述，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》一文后，钱穆深受感染，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，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，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，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，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，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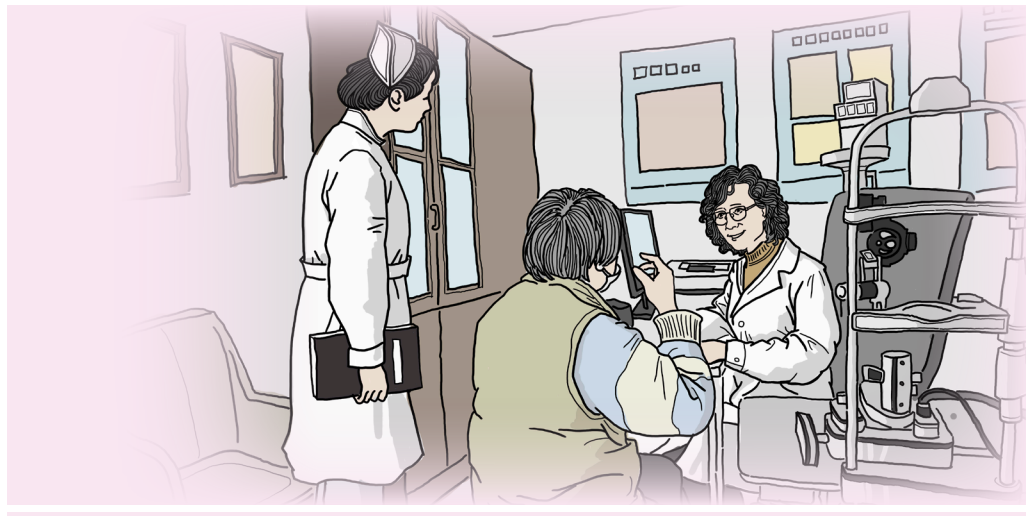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，依靠着勤奋自学，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。1927年，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，在这里，他完成了《国学概论》，并开始撰写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。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，返家小



▲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

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，在读过他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书稿后说：“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，宜去大学中教历史。”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。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。

36岁那年，钱穆应顾颉刚的约稿，撰写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。文章一发表，立即震动了学术界，使人们从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。顾颉刚



看。这次，我在肾病科住院透析了，医生叫我来会诊，我看到你出诊，想让你给我会诊，行不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我给他做了检查，眼底很好，10多年了，视力还保持在1.0。看了他的眼底激光，我真是满意当年的治疗，这些都是法轮大法的恩泽。

再创医疗奇迹

近10年来，我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。这种手术难度高，风险大，学习曲线长。我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我的手术是在玻璃

体模拟器上学会的。在我独立做这种手术之前，我只给主刀医生做过助手，对玻璃体手术的操作没有任何体会。

在2019年的眼科年会上，我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，我就去做了练习。我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没有失误，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。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，我对做这种手术有了信心。

记得我第一次做这种手术时，患病状况是玻璃体积血，病人非常信任我。我在术前，认真评估了病情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

了很多，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。

主任愿意收我当学生。所以，次年我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。毕业后，主任把我留院工作，做了主治医师。

我当主治医师时，兼顾科室眼底激光室工作。我的好多病人经常跟我反馈说：“医生，我去某医院看眼睛，医生一看我的眼底，就说：‘这激光打得太好了！’问是谁打的？”

记得在2000年年初，有一个女患者是分支静脉阻塞，视力0.3。当时这个疾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，我给她做了激光治疗，视

力恢复到了0.8。后来，她的亲属给她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。

看完后，那位专家问：“这激光是在哪里打的？这激光打得太好了，比我们医院打得都好。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。”患者回来找到我，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。她还说：“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，你技术好，为人好。”

大约8年前的一天，我正在出诊。有一个60岁的病人进诊室找我，说：“10多年前，我的糖尿病眼底病是你给我做的激光，我一直挺好的，就没再找你

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，教授国文。此后，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，后来还开了一门“中国政治制度史”、一门“中国通史”。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爆满，颇受学生好评。他在北大教了4年课，又在西南联大教了两年课。

除此之外，钱穆还在清华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兼课。

1935年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出版，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，私下对人评价道：“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。”（按：王静安即王国维。）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。

北大、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，钱穆撰写了史学巨著《国史大纲》，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，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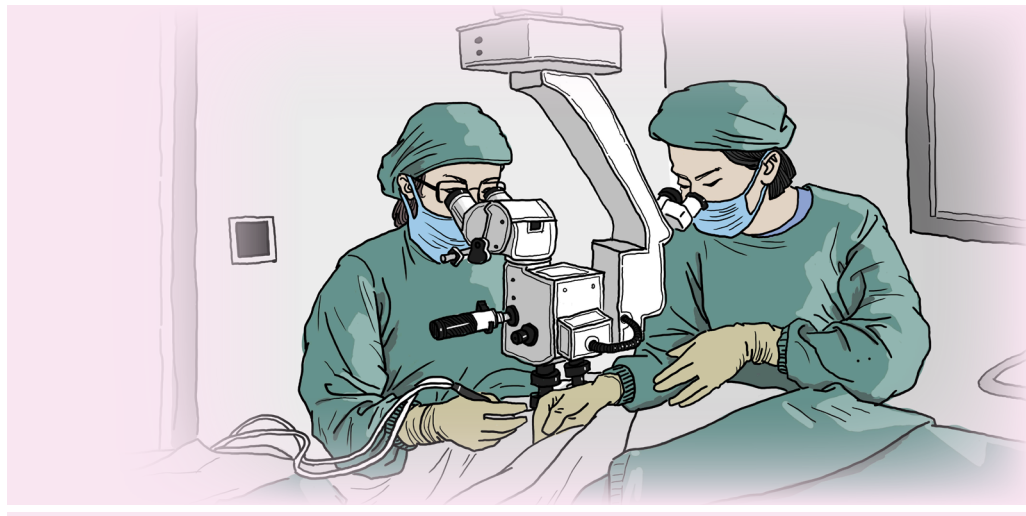
抗战胜利后，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，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。钱穆最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，作《湖上闲思录》和《庄子纂笺》。

毛的一份文告 让钱穆选择离开

1949年春，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。当时，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，选择了留在大陆，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。原因何在？大陆《财经》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《师友杂忆》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：

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，开始向江南挺进，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。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，劝钱穆留下来。钱穆问，君治古文辞，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，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？基成先生不语。

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。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枭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，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，所以转赴香港去了，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。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。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，桃李满天下；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，却在1959年的



呛，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，患者也就得不到最佳治疗效果。

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，让我能善待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。无论贫富、贵贱，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。每一次手术，我都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，认认真真、尽心尽力地去完成。

提升技术水平

同时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无病一身轻，干再多的活也不累，总是精力充沛。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，我的记忆能力也增强

因为一晃，主刀医生就会恶心，头晕，发脾气。严重的，就晕下台了。

师父让我们凡事都先替别人着想，所以我并没有责备助手。我的心很平静，脑子里想的是他的不容易。我平和地说：“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和台上的护士做。”由于护士没做过助手，我还是没法继续手术。

后来，我的助手休息了几分钟。回来后，把镜子扶得稳稳的，我很快完成了手术。最后，这个病人视力恢复到了1.0。要是按着我以前的性格，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。我自己也会被气得够

所。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，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。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，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，劝他回到大陆。

钱穆在回信中说，他看见冯友兰、朱光潜这两位朋友，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，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，丧失了人的尊严，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。他愿效仿明末的朱舜水，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，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。

同时，钱穆继续著书立说，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。他在《中国思想史》中写道：“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，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。……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，在很高的山上滚下，越接近崩溃的时候，其力量

中共“拔白旗”运动中被大量焚毁，钱基博最终郁郁而亡。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。

创办新亚学院 拒绝中共统战

钱穆到香港后，创办了新亚书院。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，即公开在校刊撰文，直指“本学院创始，在一九四九年之秋，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，故本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”，“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，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，以免误入歧途，既误其本身前途，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”。

事实上，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，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分子；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、牟宗三及徐复观等，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。

经过艰苦努力，新亚书院越办越大，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

患者贴心的眼科医师

我是一名眼科主任医师，今年57岁，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后我提升了道德。法轮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使我的医术突飞猛进，眼科手术技术得到同行的赞叹，也使很多患者重获光明。

尽职尽责

我过去说话嗓门高，高高在上，瞧不起人。修炼后，我认识到了这个缺点，带着真正关心患者的善心，在与患者交谈时，我尽量把语速放慢，语调降低，让患者有亲切感，使他们感到温暖。

在周六、周日，我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，换药，不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，因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情况，如果病情有变化，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。我一直按真、善、忍的法理去要求自己，真心为每一位患者着想，病人对我充满信任和敬重。

2013年9月，我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、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，这个手术非常难做。当我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，我的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扶的镜子晃得我看不清，使我无法做手术。一般情况下，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。



▲ 1949年，一群国内学者南迁香港，他们基于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命感，于是创立新亚书院及研究所。图为钱穆先生在圆亭讲话。

越大……三面红旗多恐怖，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，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。”可见，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，而对毁灭文化、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。

晚年坚拒中共国号

1965年，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，去马来西亚讲学。两年后，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、故

宫博物院研究员。六、七十年代，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，毫不客气地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。

1986年，钱穆在文章《新春看时局》中，依然否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”，因为这国号代表“从此以下，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，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斯来领导”；他更直言，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，两岸不能谈统一。

1990年，钱穆去世，享年96岁。

结语

可以肯定的是，若钱穆留在大陆，不仅连性命不保，而且也不可能创办新亚书院，更遑论长寿如此。至于性格刚烈的傅斯年，同样未必见容于中共。显然，他们的慧眼让他们逃脱了中共的戕害。从这一点上说，那些错信了中共、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们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。

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

陈寅恪：学贯中西，通晓 10 余种语言，甚至包括梵文、西夏文和突厥文，被称为“中国最博学之人”。文革开始后，他家被大字报覆盖，远望如白色棺材；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，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。去世前一天下午，气脉已竭的他还被勒令“口头交代”，他说“我如在死囚牢中”，留下了“涕泣

对牛衣”的诗句。

刘文典：民国时期被国民政府视为“国宝”的国学大师，他学识渊博，通英、日、德、意等国文字，精研“淮南子”和“庄子”哲学，而且恃才傲物。在中共执政的 50 年代中后期的批判中，他低下了高傲的头，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，批判自己。最终，因病不治而亡。

熊十力：现代哲学家，新儒家开山鼻祖，国学大师。文革时，由于迭遭抄家、批判等变故，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，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，连裤袜之上，都写着对“文革”的抗议。他常常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，跌跌撞撞，双泪长流，口中长念“中国文化亡了……”然而，街市

熙攘，人皆自危，没有人理会他。后来，熊十力病逝。一代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，被残酷地淹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浊流之中。（选自看中国）◎



▲ 陈寅恪



▲ 刘文典



▲ 熊十力

年获航空、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，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。1955 年回国。

钱三强，中国原子弹之父。16 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1932 年，他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。1940 年，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。1948 年夏天，钱三强回国。

钱伟长，1931 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、研究生院学习。1940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，并获博士学位。1942 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工程师。1952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，数学博士。

……

相反，在中共治下的教育，却一落千丈。在毛时代，知识分子被称为“臭老九”，随意地侮辱，践踏。越是大师越挨整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（毛语）。“整人



▲ 钱学森



▲ 钱三强



▲ 钱伟长

运动”对教育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。文化的血脉、承传和精华，统统被焚毁捣烂。

到了今天，物质与财富似乎比以前丰富了，但就教育而言，“九年义务教育”成了虚假的义务教育；大学学费高得惊人，学校已然成为盈利单位；国家对学校的财政支出，微薄得可怜，相比官员们的公款消费，简直是“九牛一毛”；政府、公检法大楼盖得各个是雄伟而坚固，相比学校的“豆腐

渣工程”，可谓“真金白银”。

民国时大学的很多大师，他们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道德高尚；而现今的中国，许多大学的“导师”“教授”灵魂堕落，劫财劫色，被学生讽称为“教兽”，为人师表的古风已经荡然无存。

待拨乱反正之时，必将驱除欧洲之外来马列邪灵，还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。（选自看中国）◎



▲ 1937年7月17日，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“最后关头”演说。

“对教育的投入，战时要当平时看。”

——蒋介石

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，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。

有人说，民国出产大师。回头看，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，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枯竭的时期，仍然大笔地投入教育，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。

共产中国的大师，多是中华民国培育的，但是被中共说成是自己的成就和科技光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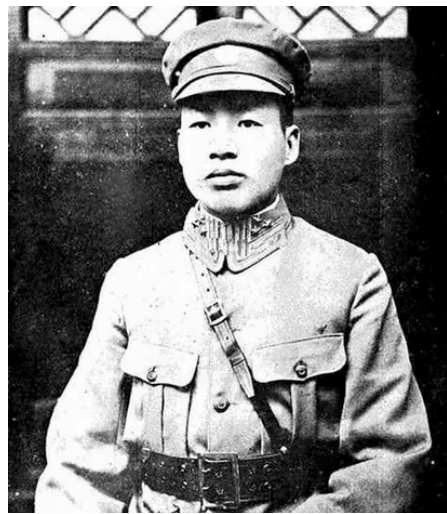
钱学森，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。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，翌年获硕士学位，后入加州理工学院，1939

民国时期为何出大师？

被中共诬为“大地主”的刘文彩的弟弟，也就是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的刘文辉，说过一句狠话：“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，县长就地正法。”

这话有个来历。1939年1月1日，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。同年，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《西康》，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，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。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：“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？”县长答：“刘主席有令，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，县长就地正法。”

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，凸现他对教育的重视，做



▲ 刘文辉

到了“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”。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，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。

孤立地看，这只是刘文辉的“个人之举”，其实不然。1935年，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四届

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，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。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，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，尤其是看得见的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。自抗战爆发后，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，关税收入丧失，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。

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，大批高校不得被迫西迁，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，改称西南联合大学。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，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。

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先生说，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，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。“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，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，这等于政府向

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，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。”

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，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，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，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《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，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，为教育完全兜底。

抗战期间，由中学到大学毕业，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，共达128000余人，这其中就包括了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钱骥、姚桐斌、邓稼先、程开甲、屠守锷、陈芳允、任新民、朱光亚、王希季等9人，还有李政道、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，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。

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，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，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，学生不减反增。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.4%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%，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。

▶ 民国抗战时期的幼儿园和小学。



▼ 就是在这些低矮的茅草房里，在硝烟与炮火声中，西南联大弦歌不辍，时至今日，仍让人追怀不已。

